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Yeung Yue-man, PhD(*Chic.*),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ssociate Director: Sung Yun-wing, PhD(*Min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台灣國族認同的再檢驗 R 與 Q 的對話

孫同文
王家英

香
港
亞
太
研
究
所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台灣國族認同的再檢驗

R 與 Q 的對話

孫同文

王家英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台灣國族認同的再檢驗

R 與 Q 的對話

作者簡介

孫同文教授為台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

王家英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

鳴謝

本文資料採自「2001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民國九十年立法委員選舉全國大型民意調查研究」計劃，計劃主持人為黃紀教授，該計劃資料由國立中正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國立中山大學民意調查中心執行，並由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釋出。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的協助。

© 孫同文 王家英 2004
ISBN 962-441-142-5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前言

長期以來，由於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持續的國際孤立和兩岸的分裂分治，以及對岸潛在的武力威脅等歷史結構因素的影響，台灣社會一直隱伏著國族認同的問題（Mendel, 1970; 方孝謙, 1994; 戴國輝, 1994）。而隨著台灣解嚴以來快速的自由化與民主化進程，過去隱而未顯的國族認同問題逐漸地演變成為國族認同的危機（石之瑜, 1993; 王家英, 1994; Chun, 1994; Wong, 2001）。事實上，國族認同的競爭和衝突，已經成為目前台灣最重要的政治現象之一（吳乃德, 1996:7; Wong and Sun, 1998），並自1990年代初以來，深刻地影響和牽動著台灣各個層次的選舉。國族認同危機指的是：

原來的國族認同（如台灣過去的大一統中國認同）因種種歷史結構變遷而走向崩潰解體，但與此同時，這解體並沒有即時帶來新的、統一的（為絕大部份國民所接受的）國族認同的出現，相反，不同的國族理念與論述（discourses），在舊有的國族認同的灰燼中紛起競生，造成了國族認同的相對化與模糊化，不單使國族的發展陷於掙扎混沌，方向難辨，亦使有關的國民經歷到深沉的集體意識的矛盾與喪失（王家英、孫同文, 1996:322-23）。

即使存在著多種不同的國族認同論述（王家英、孫同文, 1996; Wong and Sun, 1998），其中相互衝撞最激烈的應屬「台灣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無論是在一般性的認知，

或是在嚴格的相關學術研究當中，「台灣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往往被界定為水火不相容、尖銳對立的兩個典型（有純理型 [ideal type] 之意），一方面是理念之爭，另一方面則是代價不菲的政治角力（游盈隆，1996:42）。二者之間衝突的嚴重性，已經被視為是台灣政治與社會分歧的主要基礎（徐火炎，1996:89）。多數的實證研究也是在相同的認知基礎上展開，嘗試尋找二者之間的衝突在各個政治或社會議題上所烙下的痕跡（王甫昌，1993；吳乃德，1993，1996；陳義彥，1994；游盈隆，1994；徐火炎，1996；張茂桂、吳忻怡，1997）。必須說明，這些研究基本上所關心的問題是「台灣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之間的差異，可能會在哪些議題上，導致怎樣的以及何種程度的歧異觀點。關鍵在於，在台灣社會的具體國族認同建構中，「台灣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是否真的屬於所謂的兩極（bi-polar）論述呢？也就是說，凡是「台灣民族主義」者所贊成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必然反對，而且反之亦然呢？果真如此，二者之間的衝突與競爭將涉及「零和遊戲」，成為生死存亡的鬥爭。

反過來說，如果「台灣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之間即使存在相當巨大的歧異，但若同時蘊涵著潛在的妥協和塑造共識的基礎，則可以期盼經由溝通與對話，在國族認同的危機中浴火重生，而這正是本研究的基本出發點。本研究的另一個假設是，任何存在於「台灣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之間的相似觀點之所以隱而不見，可能涉及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存在無法或不容易探測的障礙。因此，本研究嘗試引用另類的研究方法—Q方法—來探討上述議題。下面的討論將分為幾個部分：首部分除簡述國族認同的意涵外，主要是釐清目前相關實證研究的設計與操作；第二部分將針對Q方法論進行說明，並且與常用的民意調查（R方法論，R Methodology）相互比較；第三部分是本研究的研究設計與操作；第四部分是研究結果的陳述，以及分析與討論；最後部分是結論。

國族認同的實證研究

依照民族主義的內涵，國族認同指的是社會成員所認同的唯一適當的、具合法性的國家（state），應是政治與族群疆界取得一致（吳乃德，1996:10）。Pye（1971，轉引自徐火炎，1996:90）曾經指出四種可能產生國家認同危機的原因：（一）領土與地理疆界變更；（二）階級分歧；（三）族群對立；（四）急遽社會變遷。從當代台灣的發展過程觀察上述四種原因，即使不能確立第二項原因的存在，其餘三者，包括有效管轄區域與法統之辯、省籍因素的發酵、冷戰到後冷戰的國際情勢變遷與解嚴前後的威權轉型，都對台灣國族認同的危機產生相當程度的激化作用。

關於台灣國族認同的學術研究，約可粗略地區分為歷史結構研究和社會調查研究兩大類。歷史結構研究偏重於對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與變化的縱深描述與分析，例如日本殖民統治對於台灣民族主義興起的影響（林勁，1993；方孝謙，1994），省籍情結在台灣民族主義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張茂桂，1993；戴國輝，1994），國民黨國家機關對於中國認同的建構及其引發的各種衝擊（戴寶村，1993；Chun，1994），以及兩岸對立和台灣民主化（王家英，1994）或是反對運動（王甫昌，1996）對於台灣民族主義的推動或激化作用。另一方面，社會調查研究主要是以問卷調查的量化方法，橫向地在特定時空當中，尋找當時台灣人口中各種國族認同（尤其是統獨認同和族群認同）的分布結構，並且嘗試釐清此一分布結構與各種社會、政治、經濟、族群等因素的關聯性（王甫昌，1993；吳乃德，1993，1996；張茂桂、吳忻怡，1997），又或是各種國族認同對於投票行為的影響（陳義彥，1994；游盈隆，1994；徐火炎，1996）。

在台灣國族認同的社會調查研究中，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基本上是分開處理的：前者（政治疆界）主要是依照問卷調查

當中對「獨立/統一」問題的回答而歸類；後者（族群疆界）則是以「台灣人/中國人」的測量而區分。¹這樣的研究設計可能產生幾個值得討論的問題。首先，吳乃德（1996:9）認為：「在當代台灣的發展過程當中，『台灣人』的族群意識和對『台灣』的國家認同可以說是同步展開的。」而且幾乎所有的實證研究均顯示，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存在高度的相關性。更何況歷史結構研究所展現的結果亦顯示，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這兩個概念的意涵相當豐富，且在台灣的歷史發展經驗中交互糾纏，二者之間呈現高度且顯著的相關性，分開處理可能冒著概念窄化的風險。

其次，即使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能夠合併處理，囿於研究方法的限制，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台灣人/獨立）和「中國民族主義」（中國人/統一）又被視為兩個相互矛盾、互不相容，甚至完全對立的概念，²這又可能忽略了這兩種論述之間可能存在著基於共同發展歷史背景所鋪陳的細微相通之處。另一方面，即使將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合併分析（孫同文，1998），卻可能無法突顯台灣民眾國族認同內部多元複雜的主體論述結構。

王家英和孫同文（1996）曾經運用重構理論和Q方法論，從受訪者的主體性（subjectivity）角度，來探討台灣的國族認同論述。該項研究發現，當時台灣至少存在著中國民族主義、維持現狀論、認同混亂、台灣優先論，和台灣民族主義這五個連續勾連的國族認同論述。雖然台灣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之間確實存在著相互矛盾的特質，但是一方面，某些台灣民眾可能同時穿梭於兩種或以上的國族認同論述之間；另一方面，各種論述之間更存在著四項寬廣的共識（詳見後述）。換言之，該項研究顯示了有關台灣國族認同研究統獨二分，或統一、維持現狀、獨立三分分析架構的不足，並重構出不同國族認同論述內部各層面的深刻內涵，以及彼此之間矛盾與共識兼而有的複雜關係。

誠然，Q方法論與一般民意調查所運用的量化研究（所謂的R方法論），無論在基本假設、研究設計和操作等方面均迥然不同，引用Q方法論的研究成果來檢視或批判R方法論的缺陷可能有所偏差，反之亦然。比較務實而建基於實證的途徑，應是將Q研究方法的設計與操作，運用於民意調查所蒐集資料的分析層次，亦即是將兩種方法論合併處理，以展現Q方法論在研究主體性方面議題的適用性。此次「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恰好提供了這種機會。

R 方法論與 Q 方法論

Q方法論是英國心理學家William Stephenson（1902-1989）在1935年投書《自然》（*Nature*）雜誌的信件中首次提出（Stephenson, 1935）。Stephenson早年曾經擔任過Charles Spearman（因子分析 [factor analysis] 的始創學者）的最後一位研究助理，卻開創出一條完全不同的研究途徑。著名的統計學者Cyril Burt曾經與Stephenson在1930年代中期，就Q方法論與R方法論的差異進行討論，最後僅能得出雙方同意在資料矩陣（data matrix）的觀點上完全相反的結論（Burt and Stephenson, 1939）。Burt認為在因子分析的大家族，是基於存在著唯一的（one and only one）資料矩陣，是由種種客觀測量（objective test）所獲得的分數（scores）所組成；Stephenson則認為實際上存在著兩個分別獨立的資料矩陣，一個是如Burt所宣稱的客觀測量，另一個是由主體性的資料所構成。在1935年的原始信件中，Stephenson就非常清楚的表示，R方法論所關心的是「從母體中選取的n個人，每一位被m項測量來檢測」的結果；³而Q方法論則關注於「由n項不同測量（如文句、圖片、特徵或其他可測度的物件）所構成的母體，每一項測量是由m位個人來衡量或評分」。⁴根據Brown（1997）的分析，除了資料矩陣的差別之外，R方法論和Q方法論最關鍵的分歧

點在於，個人（受訪者）在前者是被動地被觀察與測量，而後者則是個人主動地回應。相對而言，R 方法論是以測量（例如民意調查）為主體，受訪者是被測量的客體；在 Q 方法論中，個人的主觀意見是主體，用以測量的工具則是客體。表 1 歸納了 R 與 Q 方法論在基本假定（postulate）方面的差異。

相對應於 R 方法論，論匯（concourse）近似於母體，Q 樣本等同於樣本，而二者（論匯與 Q 樣本）都是指稱關於特定主題的意見、觀點、或命題，而非像 R 方法論中所代表的個人。

表 1：R 與 Q 方法論假定的差異

R 方法論	Q 方法論
母體（population）為個人的集合	母體為意見、觀點、命題的集合
變量（variate）為所有受訪者的某種屬性或特質；受訪者在回答某一問題時，基本上假設是不受其他題目的答案所影響	變量為在特定互動的情境下，個人對於所有命題的意見表示；受訪者在回答任何一個命題時，都是與其他命題相互比較的結果
變量之間並不互動，操作是依據單一變項的界定而定	變量在特定互動的情境下可能互相影響
在每一個人之間存在差距的條件下，轉換假定（transitory postulate，意即若 $x > y$ 而 $y > z$ ，則 $x > z$ ）得以成立	轉換假定是基於一個人自身（intra-individual）對於各個命題的意見差異條件下成立
測量分數針對受訪者的每一個變量而轉化為標準值	測量分數是根據單一個人的排序結果（array）而轉化為標準值
受訪者的測量分數大致呈現常態分配	排序結果的測量分數大致呈現常態分配

資料來源：Stephenson（1953:58）。

由於 Q 方法論所探討的是論匯主體性的內涵與結構，其推衍的對象是命題所代表的論匯，而不是受訪者所代表的母體（Dryzek and Berejikian, 1993:52）。Q 方法論的目的在於橫向地切進特定的歷史時空當中，企圖尋找存在於某特定主題當中的各種論述，以及其內涵與結構。

在具體的操作層面上，Q 方法論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分為四個步驟（Brown, 1980; Dryzek and Berejikian, 1993:50; 王家英、孫同文, 1996; Wong and Sun, 2000）：

- 一、論匯的蒐集：理論上，論匯是指有關特定主題的所有觀點、意見、命題等的匯集；實際上，論匯大多只能做到盡量地蒐集所有相關的主要觀點和意見而已。
- 二、從論匯中，因應研究的需要選取一組適合操作和有代表性的意見或觀點，作為 Q 方法論的命題樣本，即 Q 樣本。Q 樣本的篩選應該盡量避免研究者本身的價值偏好與取向，即使在論匯的蒐集與整理工作（例如基本的編輯校對）亦應如此，否則容易影響研究的客觀性。為了確保 Q 樣本選擇的嚴謹性與周全性，以及上述論匯蒐集的完整性，應經常採用複因設計（factorial design）（Brown, 1970）。
- 三、將 Q 樣本讓受訪者按照嚴格的程序來排列，排列的方式主要是根據受訪者的主觀好惡，將命題按照研究所設定的指引條件（condition of instruction），分配於不同的連續差序範疇（例如「從最不同意到最同意」、「從最不喜歡到最喜歡」、「從最不像我到最像我」）之中，而位於中央的則屬於中性範疇（沒有清楚的好惡傾向）。經過排列定序過程所得到的結果稱為 Q 排列（Q sort），代表每一位受訪者的論述結構。
- 四、先計算經過排列定序的資料間的相關係數，再進行因子分析，其結果（各項因子）展示了存在於所有受訪者主體觀

點的不同模式，也就是存在於特定主題論匯中的種種論述。

Q 方法論主要是針對主體性的研究而設計，其獨特之處在於讓主體直接表述他們的內在世界。Q 方法論完全相信主體對於自身經驗的掌握與組織能力，讓主體自主地對 Q 樣本排列定序，便充分反映此一特色。排列定序過程所包含的意義，就是讓主體按照其內在的認知，重新賦予世界秩序和意義。Q 方法論者稱這種可以經由客觀檢定的主體性為「操作主體性」(operant subjectivity)(Brown, 1980:4)。操作主體性與一般問卷調查的操作主義 (operationalism) 之間的最大差別是，前者的所有操作範疇均來自主體本身，並由主體排列定序，所以整個操作過程可以說是主體性的表現；後者則主要是來自研究者的預先設定，並外在地加諸於主體之上，容易壓抑或扭曲主體的真正意向 (Brown, 1980:4)。對於 Q 方法論者而言，嘗試判斷個別命題的真偽是無意義的，因為主體論述既然是個人內在自我的整體表達，個別命題根本沒有真偽可言，它們的意義只存在於命題與命題之間的關係脈絡 (contextuality) 之中 (Brown, 1980:46-47)。

研究設計

本研究嘗試將 Q 方法論的基本假設和資料矩陣的設計，應用於分析此次「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運用 R 方法論) 所蒐集的資料，所涉及的主題是台灣民眾的國族認同。Rhoads 及 Sun (1994) 曾經運用同樣的程序，來檢測「權威性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的意義與內涵。許多討論「權威性人格」的文獻都專注於如何修正、改良 F 量表 (F Scale) 的效度與信度 (Shils, 1954; Altemeyer, 1988)，但都維持著一項不變的基本假設：F 量表是科學的測量，不會受到時間、空間或文

化等因素的影響。Rhoads 及 Sun (1994) 的研究卻顯示，經由 F 量表所篩選出來、具有「高度權威性人格」的受訪者 (從 239 位台灣與美國的大學生之中篩選出來)，其資料經由轉換的過程，⁵ 並置於 Q 方法論的因子分析之後，卻呈現兩個因子，一個是傳統認知的「權威性人格」因子，所有受訪者與之呈高度正相關；另一個是「文化」因子，台灣受訪者與美國受訪者分置於此一因子的兩極。換言之，「放諸四海而皆準」、科學地測量「權威性人格」的 F 量表，並未能夠細膩地分辨出蘊含其中的文化差異。

為了達到本研究的目的，我們先從所有受訪者之中選取所謂典型的「台灣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受訪者。國族認同 (將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結合) 類型的建構是依照下列兩條問題的交叉分析：⁶

- K1. 在我們社會上，有人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說都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
- K2. 關於台灣和大陸的關係，這張卡片上有幾種不同的看法：(一) 盡快統一，(二) 盡快獨立，(三)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四)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五) 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六) 永遠維持現狀。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種？

由於我們的研究對象是典型的「台灣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受訪者，本研究在第二題保留了「盡快獨立」和「盡快統一」這兩個選項，其餘選項均合併為「其他」。上述兩題交叉分析的結果呈現了國族認同的各種類型，其頻數和百分比臚列於表 2。

我們所謂的典型「台灣民族主義」者，是指那些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且贊成台灣「盡快獨立」的受訪者，他們在此次問卷調查的受訪者當中佔了 3.4% (69 位)；而所謂典型的

表 2：國族認同類型的頻數與百分比

族群認同	國家認同 (統獨議題)			合計
	盡快獨立	其他	盡快統一	
台灣人	69 (3.4%)	657 (32.5%)	13 (0.6%)	739 (36.5%)
都是	25 (1.2%)	1,049 (51.9%)	37 (1.8%)	1,111 (54.9%)
中國人	3 (0.1%)	149 (7.4%)	20 (1.0%)	172 (8.5%)
合計	97 (4.8%)	1,855 (91.7%)	70 (3.5%)	2,022 (100.0%)

「中國民族主義」者，則是那些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並且贊成兩岸「盡快統一」的受訪者，他們佔所有受訪者的 1%（20 位）。⁷ 這 89 位受訪者的資料將作進一步的分析。

在此次問卷調查的問題當中，除了上述兩題已經用於國族認同的分類之外，與國族認同議題直接相關的計有十題。為了符合 Q 方法論所慣用的命題格式，在不扭曲問題意義的基本考量之下，這些問題僅作編輯性的修改（請參閱附錄）。在資料的轉換方面，這些問題的回答選項是依照「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一致格式，基本上符合 Q 方法論研究步驟的要求；惟在重新編碼的過程當中，將上述各選項依序賦予 2、1、-1、-2 的編碼，至於其他選項（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則全部編碼為 0，表示沒有清楚的好惡傾向。這十條問題的資料經重新編碼的結果成為每一位受訪者的 Q 排列。

經過上述重新編碼的過程，共得出 88 份 Q 排列成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⁸ 對於這些資料，我們先計算出其相關係數，再運用形心因子分析（centroid factor analysis）和因子盡簡解法（varimax solution），求得四個有關台灣國族認同的論述（因子）。表 3 列出這 88 位受訪者在這四項論述的因子負荷（factor loading），以及他們先前的國族認同類型。每一個論述的因子負荷代表著受訪者在該論述中，與一個假設為完全負荷（1.0）於此一因子的受訪者（理想化排列定序）之相對比重。

表 3 呈現了幾項值得進一步說明的觀察：

- 一、所有的四個論述均是兩極論述，也就是說，凡是一方贊成的，另一方一定反對，而且贊成與反對的強度呈現高度的正相關。
- 二、即使如此，典型的「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應非傳統所假設或認知的兩極對立，否則將只會呈現一個也只有一個兩極化的論述。然而，這 88 位所謂的典型國族認同者，針對十個命題，卻展現了至少四個論述。雖然都是兩極論述，但受訪者的國族認同類型在每一個論述的組合也都不盡相同。
- 三、論述一和三可能是構成傳統對於國族認同兩極化認知的一部分原因，因為「台灣民族主義」者與「中國民族主義」者在這兩個論述中確實呈現兩極對立的分布。在論述一當中，24 位「台灣民族主義」者構成了正極，另外 11 位「中國民族主義」者則構成了負極；在論述三當中，有關的受訪者人數是 15（正極，「台灣民族主義」者）比 1（負極，「中國民族主義」者）。必須說明的是，Q 方法論並無法推論在受訪者所代表的母體中是否呈現相同的比例，也不特別在意每一個論述在受訪者所代表的母體中的具體分布狀況。
- 四、同樣重要的是，論述四則呈現「中國民族主義」和「台灣民族主義」兩種國族認同類型夾雜的現象。在論述二當

表 3：受訪者的因子負荷與國族認同背景

受訪者	論述一	論述二	論述三	論述四	國族認同
60	0.8821	0.2319	0.1137	0.3113	台灣民族主義
1	0.8651	0.0028	0.0235	-0.3161	台灣民族主義
46	0.8528	0.1158	0.4342	0.2227	台灣民族主義
18	0.8361	0.1022	0.2909	0.2035	台灣民族主義
25	0.8062	0.1040	0.3161	0.0803	台灣民族主義
31	0.7983	0.5470	0.1961	-0.1036	台灣民族主義
13	0.7930	0.3457	0.3932	0.2787	台灣民族主義
51	0.7881	0.3154	0.4189	0.3090	台灣民族主義
41	0.7838	0.3348	0.4011	0.3289	台灣民族主義
50	0.7775	0.1449	0.4020	0.2457	台灣民族主義
59	0.7720	0.3014	0.4441	0.2989	台灣民族主義
33	0.7687	0.2528	0.5057	0.2572	台灣民族主義
76	0.7687	0.2528	0.5057	0.2572	台灣民族主義
84	0.7552	0.3298	0.5004	0.1999	台灣民族主義
74	0.7455	0.3084	0.4002	0.4149	台灣民族主義
2	0.7381	0.3909	0.2994	0.2739	台灣民族主義
37	0.6931	0.4379	0.4076	0.3520	台灣民族主義
43	0.6931	0.4379	0.4076	0.3520	台灣民族主義
30	0.6897	0.4742	0.2631	0.3866	台灣民族主義
32	0.6812	0.2846	0.1546	0.3092	台灣民族主義
7	0.6800	0.5224	0.4279	0.0184	台灣民族主義
55	0.6493	0.5785	-0.2885	-0.2411	台灣民族主義
16	0.6407	0.2466	-0.1407	-0.1214	台灣民族主義
24	0.6291	0.4043	0.5864	0.3028	台灣民族主義
35	-0.6601	0.1601	-0.3029	-0.1417	中國民族主義
11	-0.6769	-0.1498	0.2176	-0.2129	中國民族主義
87	-0.6919	-0.5252	-0.2263	-0.4261	中國民族主義
36	-0.7103	0.4160	-0.5030	0.0995	中國民族主義
8	-0.7142	0.0692	-0.2759	-0.1572	中國民族主義
81	-0.7720	-0.3014	-0.4441	-0.2989	中國民族主義

表 3：受訪者的因子負荷與國族認同背景（續）

受訪者	論述一	論述二	論述三	論述四	國族認同
6	-0.7729	-0.4651	-0.3666	-0.1880	中國民族主義
15	-0.7838	-0.3348	-0.4011	-0.3289	中國民族主義
56	-0.7861	-0.1720	-0.3811	-0.4231	中國民族主義
34	-0.7881	-0.3154	-0.4189	-0.3090	中國民族主義
23	-0.8683	0.2061	-0.3157	-0.2236	中國民族主義
71	0.0783	0.9090	0.3010	-0.0842	台灣民族主義
82	0.0436	0.8024	0.0410	-0.1450	中國民族主義
42	0.5777	0.7762	0.0432	-0.0232	台灣民族主義
12	0.1954	0.7607	0.3068	0.1639	台灣民族主義
19	0.3566	0.7361	0.2140	0.4320	台灣民族主義
62	0.3162	0.6656	0.4973	0.3777	台灣民族主義
69	0.2156	0.6468	-0.2311	0.2835	台灣民族主義
66	0.3264	0.6454	0.5738	0.1151	台灣民族主義
72	0.4906	-0.6445	0.2943	-0.4039	台灣民族主義
79	0.0474	-0.8231	-0.0607	-0.1406	台灣民族主義
26	0.0988	0.3478	0.7895	0.0641	台灣民族主義
52	0.5351	-0.0292	0.7739	0.1824	台灣民族主義
4	0.0381	0.2641	0.7653	0.3036	台灣民族主義
21	0.4652	0.0319	0.7524	0.2039	台灣民族主義
49	0.4664	0.2257	0.7513	0.1524	台灣民族主義
68	0.2137	0.2980	0.7345	-0.2709	台灣民族主義
40	0.3859	-0.1917	0.7142	0.5176	台灣民族主義
65	0.0950	0.3833	0.7037	0.3307	台灣民族主義
10	0.5932	0.0322	0.7023	0.0593	台灣民族主義
57	0.4396	0.3352	0.6895	-0.2965	台灣民族主義
88	0.3088	0.5687	0.6779	0.2811	台灣民族主義
9	0.5554	0.0859	0.6744	0.2509	台灣民族主義
44	-0.2208	0.0381	0.6686	0.3179	台灣民族主義
63	0.4549	0.2128	0.6602	0.3361	台灣民族主義
77	0.4452	0.1021	0.6375	0.0494	台灣民族主義

表 3：受訪者的因子負荷與國族認同背景（續）

受訪者	論述一	論述二	論述三	論述四	國族認同
3	-0.1655	-0.3617	-0.8448	-0.1105	中國民族主義
17	0.3425	0.0834	0.2775	0.7146	台灣民族主義
58	0.6015	0.0869	0.3328	0.6910	台灣民族主義
54	0.5546	0.2553	0.4080	0.6394	台灣民族主義
22	0.4605	0.0315	0.5723	0.6339	台灣民族主義
48	-0.4166	-0.2361	-0.2017	-0.6654	中國民族主義
20	-0.1903	-0.1813	-0.1587	-0.7173	台灣民族主義
75	0.5488	0.3089	0.0166	-0.7178	台灣民族主義
39	-0.5286	0.0156	-0.0045	-0.7196	中國民族主義
78	-0.0309	-0.0558	0.2176	-0.7418	中國民族主義
28	-0.4877	0.0063	-0.3819	-0.7766	中國民族主義
70	0.2104	0.2104	0.0872	0.5799	台灣民族主義
47	0.3914	-0.2109	0.2860	0.4518	台灣民族主義
27	0.2110	-0.1197	0.5689	0.4108	台灣民族主義
53	0.5906	-0.3203	0.6146	0.3123	台灣民族主義
29	0.3519	0.5352	0.3274	0.2754	台灣民族主義
86	0.6143	0.2243	-0.0978	0.1988	台灣民族主義
5	0.3486	0.5628	0.5370	0.1479	台灣民族主義
38	0.5890	0.5730	0.2948	-0.1308	台灣民族主義
85	0.3184	0.5156	0.5065	-0.1455	台灣民族主義
83	0.1113	0.5793	0.1205	-0.1945	台灣民族主義
73	-0.1889	0.0758	-0.2336	-0.2417	台灣民族主義
45	0.5052	-0.3120	0.5023	-0.3141	台灣民族主義
80	-0.4234	-0.3657	-0.2130	-0.3589	中國民族主義
61	-0.0282	0.0686	-0.3222	-0.3722	中國民族主義
64	0.3889	0.3760	0.6024	-0.3884	台灣民族主義
67	0.0998	0.0449	-0.3131	-0.4506	台灣民族主義
14	-0.3717	-0.2952	0.1145	-0.4716	台灣民族主義

注：p < .05 顯著程度的計算依下列公式： $p = Z_{(0.05)} X (1/N) = 0.62$ ，公式中 N 為命題數目 = 10。

中，1 位「中國民族主義」和 7 位「台灣民族主義」受訪者構成了正極，與之相對的卻是 2 位「台灣民族主義」者；論述四的正極則是由 4 位「台灣民族主義」受訪者所構成，負極的 6 位受訪者當中，卻也有 2 位也是「台灣民族主義」者。這說明了即使是典型的「台灣民族主義」者或「中國民族主義」者，對於國族認同所涉及的各種面向，亦有可能與其他同類的國族認同者，在某些特定的國族認同面向上彼此意見不同。

五、另外，尚有 17 位受訪者並未顯著地負荷於上述任何一個論述，也就是說，除了上述的四個論述之外，即使在所謂的典型國族認同的受訪者當中，仍然可能存在更多種的論述內涵。

資料分析與討論

這些觀察旨在說明，一般民意調查將「台灣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視為兩種完全對立的類型的假設可能不盡完整，而對於上述四種論述的內涵，必須針對每一個命題在各個論述中的因子數列（factor array）進行詮釋。陳述這四個論述最簡單直接的方法，是給予每個論述一個適當的標籤，然後再詳細地作出言之成理的說明（Dryzek and Berejikian, 1993: 52）。論述的說明必須基於：（一）論述中各個命題所共同展現的整體內在結構（inherent structure），每一個命題的意涵必須符合整體論述的結構，不能單單依其字面或任何先前選擇命題時的標準來解釋，原因是每一個命題因其在各個論述當中因子數列的高低、⁹ 正反符號的不同而代表不同的意義。（二）除了論述本身內部結構的完整性之外，我們也必須考慮每一個命題與其在其他論述的因子數列比較後的差異性。其實，這樣的描述就是論述的重構過程，不僅某些看起來重要的命題需要解

釋，亦需要找出命題與命題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澄清那些明顯存在於命題之間的內部矛盾。就此而言，論述的重構必須具有某種詮釋的想像力(hermeneutical imagination)，但也必須慎防過分的猜想。

表 4 呈現了十個命題在四個論述的因子數列和 Z 值。一般而言，為了強調命題彼此相關的整體性，Q 方法論會要求受訪者按照一定的命題分布方式來排序。舉例來說，假設有 36 個命題，從「最同意」(+4) 到「最不同意」(-4) 共 9 個的連續選項中，必須按照 2、3、4、6、6、6、4、3、2 的分配來排序，稱之為「強迫分配」(forced distribution)。由於此次分析的受訪者在填答問卷時，並非按照 Q 方法論所要求的嚴格排列定序方式排列，因此整體命題的分配將呈現「自由分配」(free distribution) 的狀態。即使如此，由於 Q 方法論所使用的統計軟體(PQMETHOD) 的設計，計算的結果(Z 值) 必須賦予一個按照「強迫分配」所得到的因子數列，因此在本研究中，Z 值比較能夠忠實地反映每個論述的內涵。下面的論述詮釋也主要是以 Z 值為分析的依據。

論述一：「傳統對立」的國族認同論述

論述一可以說是隱含了台灣社會傳統認知的對立國族認同，構成正極的受訪者(「台灣民族主義」者)認為在仍然可以與中共維持和平關係的前提條件之下，台灣應該宣布獨立(1)；¹⁰ 唯有割斷與中國的關係，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建立屬於所有台灣民眾的生命共同體(6)。因為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中國無理由干涉台灣追求獨立自主(8、10)。更何況台灣人不是中國人(5)，做為中國人也並不值得驕傲(3)，即使兩岸的條件相當，兩岸也不應該統一(2、7)，結合在一起也不見得有前途(9)。

負極的受訪者(「中國民族主義」者)認同中國人(5、3)，

表 4：理想化因子數列與 Z 值

命題	論述/因子			
	一	二	三	四
1. 如果台灣宣布獨立後，仍然可以和中共維持和平的關係，則台灣應該成為一個新國家。	2 (1.19)	2 (1.00)	2 (1.00)	0 (0.18)
2. 如果大陸和台灣在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條件相當，則兩岸應該統一。	-1 (-0.91)	1 (0.54)	-1 (-0.93)	-2 (-1.29)
3. 不管中國是怎樣的落後，我覺得做一個中國人是最值得驕傲的。	-2 (-1.01)	-2 (-1.40)	0 (0.35)	-2 (-1.14)
4. 一些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的外省人，如果他們還是不認同台灣，最好回大陸去。	0 (0.60)	2 (1.79)	1 (0.90)	1 (0.98)
5.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這種看法是不可原諒的。	-2 (-1.14)	-1 (-0.92)	-1 (-0.67)	2 (1.20)
6. 要掌握台灣人自己的命運，就是要割斷與中國的關係，建立一個兩千三百萬人的生命共同體。	2 (1.11)	-1 (-0.73)	0 (-0.34)	1 (0.98)
7. 不管台灣與大陸在生活上有何大的差異，我們都要有耐心地加以克服，完成國家的統一。	-1 (-0.86)	0 (0.16)	-2 (-0.98)	-1 (-1.07)
8. 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台灣要追求自主獨立，中國無理由加以干涉。	1 (0.92)	1 (0.48)	2 (1.34)	1 (0.67)
9. 台灣要與中國大陸合在一起才有前途。	0 (-0.74)	-2 (-0.94)	-2 (-1.48)	-1 (-0.93)
10. 中國的歷史是中國的，我們要創造屬於台灣自己的歷史。	1 (0.85)	0 (0.02)	1 (0.82)	0 (0.42)

注：括號內的數字是每一個論述中十個命題標準化的 Z 值(Z scores)。

主張兩岸應該統一，即使有各方面的差異也應該設法克服(2、7)。唯有如此，台灣才會有前途(9)。台灣與中國本來就是一體(8、10)，是無法分割的(6)；更重要的是，如果台灣一旦宣布獨立，勢必引發兩岸的武裝衝突(1)。

此一論述可以說是理念之爭，相對於其他的論述(尤其是論述四，詳見下文)，兩極的受訪者對於尖銳衝突的命題(4)比較冷淡對待。¹¹正是這種態度，將此論述與其他論述區別出來。

論述二：「台灣優先」的國族認同論述

論述二正極的受訪者，不論是「台灣民族主義」者或「中國民族主義」者，都強調必須以「認同」台灣的利益為最優先的考量(4)。台灣獨立可能危害兩岸的和平關係(1)，或是斷然地切斷與中國的任何關係(6)，並不見得符合台灣的利益。最優先考慮台灣的利益才是獨立自主的表現(8)，台灣與中國大陸合在一起是否會有前途(9)，必須視乎其符不符合台灣的利益。目前大陸仍然相當落後(3)，如果統一對台灣是有利的，耐心地等到兩岸在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條件相當了，統一也沒有什麼不可以(2、7)。在利益的考量之下，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的問題也就不重要了(5)。

反過來說，論述二的負極受訪者(「台灣民族主義」者)認為，即使中國大陸已經不再落後(3)，或者兩岸的結合應該會有前途(9)，但台灣人並不是中國人(5)，要掌握台灣人自己的命運，建立一個不分省籍的生命共同體(4)，就必須割斷與中國的關係(6)。僅僅顧慮台灣的利益太現實了，不論在什麼情況下，台灣要獨立(1)，兩岸不應該統一(2、7)，沒有任何談判的餘地。中國可能有它的理由來干涉台灣追求自主獨立的舉動，但是台灣人所追求的是創造台灣自己的歷史(10)。

論述三：「事實現狀」的國族認同論述

如同前述，論述三與論述一可能是構成傳統對於國族認同兩極化認知的一部分原因，但是不同於論述一的理念之爭，論述三的正極受訪者(「台灣民族主義」者)認為「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8)，是對於事實現狀的認知與承認，目前兩岸關係混沌不明，主要是因為對岸的武力威脅一直存在(1)。如果承認了「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的事實，根本不存在統不統一(9、7、2)或是族群認同(5)的問題，也就無從談起是否要割斷與中國的關係了(6)。因此，「中國人」可以替「中國」感到驕傲(3)，但是中國的歷史是中國的(10)，與台灣無關，如果不能認清這個事實，那些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民眾，大可選擇自己的祖國(4)。

論述三的負極受訪者(「中國民族主義」者)不認為目前兩岸關係的現狀將是永遠的事實，中國與台灣無論是在族群(5)或歷史(10)上，都是一體(8)而不可切割的(6)，這不是可以選擇的問題(4)。即使中共的武力威脅不存在，台灣也不應該宣布獨立(1)；兩岸的分裂分治只是暫時的，兩岸唯有結合才有前途(9)，兩岸應該統一(2、7)。

論述四：「生命共同體」的國族認同論述

論述四的正極受訪者(「台灣民族主義」者)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但是必須承認台灣人也是中國人(5)，只是做為一個中國人並沒有什麼特別值得驕傲的(3)。今日台灣國族認同的關鍵議題在於，台灣民眾不分族群，都應該有台灣「生命共同體」的認知(6)，不認同的民眾不應成為此一共同體的一分子(4)。「生命共同體」就是能夠獨立自主地(8)創造屬於台灣自己的歷史(10)，並不全然必須包括大陸在內(2、7、9)，在能夠維持和平的條件下，台灣獨立應是可以考慮的一個選項(1)。

論述四的負極受訪者，不論是「台灣民族主義」者或「中國民族主義」者，都認為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兩岸可以統一（2、7），因為唯有如此才可能會有前途（9）。這些受訪者或許認為做為一個中國人是值得驕傲的，又或許認為中國沒有值得驕傲的地方，但可以各自表述（3），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根本不是一個議題（5），也毋須分得那麼清楚（4）。所謂的台灣生命共同體並不存在（6），台灣的自我歷史也不清晰（10），中國可以是中國，台灣可以是台灣，但是台灣要追求自主獨立，中國必然會以武力干涉（8、1）。

明顯地，「傳統對立」、「台灣優先」、「事實現狀」和「生命共同體」等四個論述所關心的議題，共同地建構了對於台灣國族認同的一般性討論內涵。然而，傳統認知的「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對立的假設，只能涵蓋「傳統對立」論述的內涵，並不能夠兼顧到其他的論述。另一方面，所謂的「對立」並不僅止於「台灣民族主義」者與「中國民族主義」者之間，在不同的論述當中，同類型的受訪者也可能意見完全相左，而在特定議題之內，不同類型的國族認同者卻可能抱持同樣的態度。

誠然，本研究並未能在這四個論述之間發現任何的「共識命題」（consensus statement）並不令人意外，也就是說，依照目前Q樣本的命題組合，各種論述之間毫無溝通對話的基礎，因為受訪者是被歸類為「典型的」國族認同者。或有學者認為命題8為一近似「共識」的命題，因為該命題在各個論述的Z值都呈現正值（positive value），而且差距偏小。但是該命題並未通過統計的檢驗，即使可以勉強稱之為「共識命題」，卻由於各論述都是兩極論述，所有在各論述負極的受訪者全都不贊成命題8的意見，也很難稱之為共識，這或許令人引以為憂。但是，在「台灣優先」和「生命共同體」這兩個論述之中，某些「台灣民族主義」者和「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意見卻相同，至少在討論某些特定議題的時候，二者並不是完全對立的，這或許

是雙方可以建立共識基礎的起點—如果雙方願意的話。更何況本研究僅專注於典型的國族認同者，即使在問卷調查的樣本中也僅佔少數（4.4%），其他民眾的共識基礎應該更為寬廣。王家英與孫同文（1996:346）的研究曾顯示，儘管台灣國族認同的論述內容各異，強弱也不盡相同，但仍然存有四個共同的基本看法：（一）不論是統一或獨立的主張，都應為多元民主的台灣社會所包容；（二）當今台灣具有某種形式的獨立主權；（三）即使很難想像國際社會會介入兩岸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台灣還是有權以某種形式加入聯合國；（四）台灣很難領導中國未來的發展。經過了七年的發展和政黨輪替的民主經驗，或許台灣民眾之間的國族認同共識基礎已變得更为寬廣、更為厚實了。

結論：R 與 Q 的對話

本研究的討論直接指向R方法論的限制，但必須說明的是，此處的討論一方面並不涉及認識論或本體論的探討，¹²而僅止於方法論和研究方法的層次。另一方面，本研究亦無意展示Q方法論的優越性，實際上二者的適用範疇並不相同。Stephenson（1953:30-46）原本就主張，Q方法論與R方法論是為多變項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大家族之下的兩個支流，各自的基本假設、研究對象與途徑都不相同。

本研究顯示，即使使用R方法論的資料，Q方法論仍然能夠展現其適用性。當然，這樣的研究設計違反了Q方法論的一些基本假設，也就是讓受訪者依照自己的主體性，在特定議題的相關命題當中，思考各命題的關聯性。問卷調查的設計，基本上是假設各問題之間是獨立的，甚至要避免受訪者受到題目前後位置、格式、字句等問卷編排的影響。此次問卷調查的受訪者在作答時，並沒有要求他們去思考前後答案的一致性，也未按照Q方法論所要求的嚴格排列定序的規定。再者，問卷調

查的對象是母體（個人），Q方法論的研究範疇是論匯，問卷當中的十個命題固然涵蓋了不少面向，但並不是從一個國族認同的完整論匯中，經過複因設計的過濾而精心挑選出來的。¹³更何況從Q方法論慣用的「強迫分配」到配合R方法論（問卷調查）資料的轉換而來的「自由分配」，偵測論述的敏感度相對降低，也多少增加了詮釋的困難度。但是從所得的資料當中，仍然能夠得出至少四個「言之有物」的論述，顯示了受訪者在填答問卷時，仍然不經意地流露出其對於議題認知的內在結構，由此而讓我們得以重構傳統的典型「中國民族主義」者和「台灣民族主義」者背後多元複雜的國族認同內涵和面貌。

如此的設計並不表示Q方法論與R方法論僅是資料矩陣的差異，或是其間的差異可以用資料轉換的方式解決。Q方法論與R方法論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不可共通性」，此類的嘗試僅僅企圖打開兩種方法論之間的可能對話，固然有其限制，但合作互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例如，問卷調查的問題是研究者針對研究議題，依照理論而設計，其目的在於驗證理論，其解釋與分析也必須依照原先所賦予的意義，屬於「先驗的理論建構」。但是Q方法論所強調的「操作主體性」，命題的先驗性意義（*a priori meaning*）並不必然是受訪者排列定序的主要依據，也不能限制研究者的詮釋（Brown, 1997:11）。因此，如果在設計問卷調查之前，能夠針對研究議題先試以Q方法論的分析，應可搜尋出更豐富的論述架構和內涵，進而按各種論述來設計問卷的問題。這應較能貼近研究議題的真實面向，其所涉及的層面也應比較完整全面，更可免於受到現存理論框架的層層限制，從而模糊或顛倒了問題與理論之間的關係。Q方法論也將從如此的合作當中受益。Q方法論是透過對於少數但背景多樣的受訪者的深入研究與分析，搜尋某論匯中主體的論述結構，其推論的範圍是命題的母體（論匯）。理論上，存在於這少數受訪者的論述模式，應該也同時存在於更大的社群之中。

然而，Q方法論的研究結果並無法得知在由個人所構成的母體當中，各種論述所佔的比例，或者抱持各種意見（論述）的群體之政治、社會和經濟特徵，又或者這些論述與其他議題之間的關聯性。對於Q方法論者而言，藉由R方法論的研究途徑探討這些問題，應別具意義。

無論是對於社會科學的本土化，或是台灣社會科學研究面向與議題的深化和廣化，Q與R的對話，而非彼此競爭研究方法的優越性，應有正面的貢獻。

注釋

1. 國家認同的分類可能以簡單的「盡快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永遠維持現狀」、「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和「盡快獨立」等六個選項來區分（張茂桂、吳忻怡, 1997）；或者是用「如果台灣宣布獨立之後，仍然可以和中共維持和平關係，那麼台灣就應獨立成為一個新的國家」和「如果大陸和台灣兩地在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條件相當，那麼兩岸就應該統一」這兩個問題的答案交叉分析並建構而來（徐火炎, 1996）。

比較常見的族群認同分類方式有幾種：（一）按照「在我們社會上，有人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說都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的問題回答直接分類；（二）針對前一題回答「都是」的受訪者，再加問「請問您覺得你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還是說『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或是兩者都是？」以更清楚的界定；（三）採取自我認定的途徑，問題為：「在您個人感覺上，您比較屬於哪一個族群？中國人或是台灣人？」然後追問感覺強度，建構出「強烈中國人」、「普通中國人」、「既是台

- 灣人也是中國人」、「普通台灣人」和「強烈台灣人」等五項的量表。
2. 以吳乃德（1996:17）的族群認同研究為例：「我們對於族群意識的測量用以下的方式來操作。我們將台灣的族群認同與中國的族群認同，視為族群意識的兩端。屬於台灣族群意識的一端的民眾是：不但具有台灣族群認同（自認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同時也認為台灣人和中國人在文化上『或』利益上有所衝突，以及文化上和利益上『都』有所衝突。」如前所述，衝突誠然是政治的本質問題，但是如果能夠搜尋二者共通的觀點，溝通與妥協方有可能。
 3. 原文為「a selected population of n individuals each has been measured in m tests。」
 4. 原文為「a population of n different tests (or essays, pictures, traits or other measurable materials), each of which is measured or scaled by m individuals。」
 5. 原先的9轉換成+4，1變為-4，5則為中點0，餘此類推。
 6. 下列問題編號為此次民意調查問卷的原始編號。
 7. 由於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展現Q方法論能夠更細膩地呈現國族認同的論述架構與內涵，無關乎受訪者樣本的數量與代表性，因此只選擇了第一波調查的樣本進行篩選，總樣本數為2,022位受訪者。
 8. 原本共有89位受訪者，但其中一位受訪者（編號8640300903202，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回答，經過重新編碼之後，均為0。由於各命題的選項值絲毫沒有變異（invariate），故被排除於Q方法的分析之外。
 9. 更正確的說法是其在所有命題的標準化Z值（Z score），見後續的論述詮釋。
 10. 括號內的數字為命題編號，以下均同。

11. 在論述二當中，此一命題的Z值最高，也就是說正極的受訪者非常贊成，負極的則非常不贊成；在論述三和四當中，命題4的Z值分別是第三高和第二高。這並不表示命題4永遠將被解釋成為隱含著尖銳衝突的意思，只能說在其他三個論述的結構當中，命題4相對而言比較重要，但其意涵仍需視各個論述而定。
12. 這一層次的討論，請參閱蕭全政（未發表）。
13. 關於複因設計在Q方法論的應用，請參閱Brown（1970）。

參考書目

- 方孝謙（1994），〈殖民地民族主義與一九二零年代的日治台灣〉，《東吳社會學報》，第3期，頁161-197。
- 王甫昌（1993），〈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載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出版社，頁53-100。
- 王甫昌（1996），〈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頁129-209。
- 王家英（1994），《民主化與分離主義：台灣近年的政治發展與兩岸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王家英、孫同文（1996），〈國族認同的解體與重構〉，《政治科學論叢》，第7期，頁321-54。
- 石之瑜（1993），《當代台灣的中國意識對集體認同的反思》。台北：中正書局。
- 吳乃德（1993），〈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台灣族群政治理論初探〉，載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出版社，頁27-51。

- 吳乃德（1996），〈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頁 5-39。
- 林勁（1993），《「台獨」研究論集》。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 孫同文（1998），〈國族認同與台灣民眾對於港澳問題態度之關係〉，《政治學報》，第 29 卷，頁 113-39。
- 徐火炎（1996），〈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與黨派投票行為：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年間的實證研究結果〉，《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頁 85-127。
- 張茂桂（1993），〈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載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出版社，頁 233-78。
- 張茂桂、吳忻怡（1997），〈教育對於統獨傾向的作用〉，《台灣政治學刊》，第 2 期，頁 107-89。
- 陳義彥（1994），〈我國選民的集群分析及其投票傾向的預測：從民國八十一年立委選舉探討〉，《選舉研究》，第 1 卷，第 1 期，頁 1-37。
- 游盈隆（1994），〈台灣選民的議題取向投票：二屆國大選民的分析〉，《東吳政治學報》，第 3 期，頁 219-54。
- 游盈隆（1996），〈台灣族群認同的政治心理分析〉，《台灣政治學刊》，第 1 期，頁 41-84。
- 蕭全政（未發表）。「民意：本土與西方」。
- 戴國輝（1994），《台灣結與中國結》，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戴寶村（1993），〈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載李源禧編，《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頁 115-38。
- Altemeyer, Bob (1988). *Enemies of Freedom: Understanding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Brown, Steven R. (1970). "On the Use of Variance Designs in Q Methodology," *Psychological Record*, 20:179-89.
- Brown, Steven R. (1980). *Political Subjectivity: Applications of Q Methodology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Steven R. (1997). "The History and Principles of Q Methodology in Psych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A Celebration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William Stephenson (1902-1989)," University of Durham, December 12-14.
- Burt, Cyril and William Stephenson (1939). "Alternative Views on Correlations Between Persons," *Psychometrika*, 4:269-81.
- Chun, Allen (1994). "From Nationalism to Nationalizing: Cultural Imagin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Postwar Taiwa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1:49-69.
- Dryzek, John S. and Jeffrey Berejikian (1993). "Reconstructive Democratic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1):48-60.
- Mendel, Douglas H. (1970). *The Politics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ye, Lucian W. (1971).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in Leonard Binder et al (eds.),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01-34.
- Rhoads, J.C. Jr. and Tung-Wen Sun (1994). "Studying Authoritarianism: Toward An Alternative Methodology," *Southeastern Political Review*, 22(1):159-70.
- Shils, Edward A. (1954). "Authoritarianism: 'Right' and 'Left,'" in Richard Christie and Marie Jahoda (eds.),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Glencoe, IL: Free Press, pp. 24-49.
- Stephenson, William (1935). "Technique of Factor Analysis," *Nature*, 136:297.
- Stephenson, William (1953). *The Study of Behavior: Q-Technique and Its Method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ong, Timothy K.Y. (2001). "From Ethnic to Civic Nationalism: The Formation and Changing Nature of Taiwanese Identity," *Asian Perspective*, 25(3):175-206.

Wong, Timothy K.Y. and Milan Tung-Wen Sun (1998). "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Experience of Subjectivity in Taiwa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4(2):247-72.

Wong, Timothy K.Y. and Milan Tung-Wen Sun (2000). "Democratic Theorizing in Taiwan: A Reconstruction," *Democratization*, 7 (2):90-112.

附錄：Q 命題與問卷原始問題對照表

Q 命題	問卷原始問題
1. 如果台灣宣布獨立後，仍然可以和中共維持和平的關係，則台灣應該成為一個新國家。	K3. 有人主張「如果台灣宣布獨立後，仍然可以和中共維持和平的關係，則台灣應該成為一個新國家」。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主張？
2. 如果大陸和台灣在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條件相當，則兩岸應該統一。	K4. 有人主張「如果大陸和台灣在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條件相當，則兩岸應該統一」。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主張？
3. 不管中國是怎樣的落後，我覺得做一個中國人是最值得驕傲的。	K5a. 不管中國是怎樣的落後，我覺得做一個中國人是最值得驕傲的。
4. 一些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的外省人，如果他們還是不認同台灣，最好回大陸去。	K5b. 一些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的外省人，如果他們還是不認同台灣，最好回大陸去。
5.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這種看法是不可原諒的。	K5c.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這種看法是不可原諒的？
6. 要掌握台灣人自己的命運，就是要割斷與中國的關係，建立一個兩千三百萬人的生命共同體。	K5d. 要掌握台灣人自己的命運，就是要割斷與中國的關係，建立一個兩千三百萬人的生命共同體。
7. 不管台灣與大陸在生活上有何大的差異，我們都要有耐心地加以克服，完成國家的統一。	K5e. 不管台灣與大陸在生活上有何大的差異，我們都要有耐心地加以克服，完成國家的統一。
8. 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台灣要追求自主獨立，中國無理由加以干涉。	K5f. 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台灣要追求自主獨立，中國無理由加以干涉。
9. 台灣要與中國大陸合在一起才會有前途。	K5g. 台灣要與中國大陸合在一起才會有前途。
10. 中國的歷史是中國的，我們要創造屬於台灣自己的歷史。	K5h. 中國的歷史是中國的，我們要創造屬於台灣自己的歷史。

台灣國族認同的再檢驗

R 與 Q 的對話

摘要

依照民族主義的內涵，國族認同指的是族群成員所認同的唯一適當的、具合法性的國家，應是政治與族群疆界取得一致。檢視台灣相關的實證研究文獻，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卻基本上是分開處理的，這可能冒著概念窄化的風險；即使有些文獻是將二者合併處理，卻囿於研究方法的限制，將「台灣民族主義」（台灣人／台灣獨立）和「中國民族主義」（中國人／兩者統一）視為兩個相互矛盾、完全不相容的概念，這又可能忽略了這兩種論述之間可能存在著基於共同發展歷史背景所鋪陳的細微相通之處。本文嘗試運用探討論述主體性的Q方法論，來分析透過R方法論取得的民意調查資料，希冀能夠深入地探討「台灣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之間，可能存在的各種國族認同論述，以及其間的異同。結果發現，即使在所謂典型的國族認同者當中，存在至少四個兩極論述（「傳統對立」、「台灣優先」、「事實現狀」、「生命共同體」），並非截然是「台灣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之間的兩極對立。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Revisited

A Dialogue between R and Q

Milan Tung-wen Sun

Timothy Ka-ying Wo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refers to the belief of an ethnic group that their political state must be built upon the unity of political and ethnic boundaries. A review of the related literature shows that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 are largely treated separately in Taiwan. Separating the two perspectives can cause the no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o be dealt with too narrowly. Even though there are some studies on Taiwan that combine the perspectiv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 they are limited by their methodology in the sense that they tend to view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as two mutually exclusive concepts, thereby ignor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ubtle commonalities in these two discours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mploy Q methodology to analyse the data collected through R methodology. It is hoped that this approach can help to unfold the various discourses on national identity that may exist behind the assumed dichotom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Our study finds that behind the so-called ideal types of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there exist at least four bi-polar discourses on national identity, namely "traditional opposition," "Taiwan priority," "de facto status quo," and "life community." The assumed dichotom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is only an over-simplification of the reality.